

黃公偉 著

學
思
錄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公偉著

學
思
錄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初版

學思錄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六角正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黃公偉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
發行
所及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張樹怡 陳巧

敬以此書悼念

先考黃府君諱著之（一九六三逝世）
妣王太夫人文素（一九六二逝世）在天之靈

黃公偉 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七月於寶島旅次

時年七十七歲



影留房書在月二十年十七國民於者作
歲四十七年時

學思錄 小序

茫茫宇宙，芸芸衆生，日月之所照，風雲之所動，中國自古聖哲說天人奧秘生元，黃帝首倡「五行之精」說以爲干支天文曆數之發明，厥後五帝傳五行於夏商並傳「微危精一中」說（尙書），周人起自有庾氏之墟，傳伏羲氏八卦之統。此「三易」說的由來。東周初管子用五行，老子繼之。八卦之統，孔子用之。構爲「宇宙論」(Cosmology)之大觀。至老子說「無極」，孔子說「太極」又爲本體內象結成了「本體論」(Ontology)的精髓說，使古傳所謂「精，一，中」說垂流萬代。總歸爲「形上學」(Metaphysics)之「正統」。周孔的「易」說，至戰國鄒衍「五行轉移」說出而微。秦商鞅不用五行而失道統。漢興，初用「黃老」五行復活。漢人董仲舒，班固盛傳陰陽五行，取天人合一論。而創爲五行生剋之理則。有赤白黑「三統曆」之發明。故漢儒氣象萬千並不「粗淺」。魏晉人「佛老」流爲「易老莊」三玄，遂有「道易」之傳。唐宋以「道」主國，學者每由「天理」、「物理」，由外而內，以推「心理」、「性理」關係，深究心性交錯變化，莫不穿微入細，如周濂溪作「無極而太極」圖，言「五行定位」，以見「危」、「微」的外層作用。程朱說「易」，均本此以立論。化周易爲五行之統，故而宋儒亦並不偏促，漢宋之學以天說人，儒佛道所謂「大化」，乃渾融無跡。明人呂坤云：「漢之粗淺便着世俗，宋之偏促便落迂闊」（呻吟語）未必僖然。

易書同源，易禮並用。古人說天道，以「易」爲六經之首。班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時歷三古」。昔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孔子作「十傳」從而明之。莊子云：「易以道陰陽」，史遷云：「易著天地五行，故長於變」，揚雄云：「說天者莫辯乎易」（法言），故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傳），宇宙性命之本源，出自「精靈」，大在茲乎。等孔子言「好學近乎知」，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篇），宋儒會之以學庸孟子，爲體用之統一，乃大顯神通。學思的對象上者爲天理，下者爲情理，而功能發自心理、性理。精粗巨細無不納入其中，故總名爲「道學」或「哲學」。北宋「關學」張載概之以四句偈，頗能通透其精義。張氏云：「爲天地立心」，即立其虛靈不昧的天心。以道心顯用而貫「人心」之「危」，本自中庸。依歷史思辨，對唐五代之「破學」，張氏云：「爲往聖繼絕學」。期以湮沒失傳之易禮中庸，重放光明。對現世而言，張氏云：「爲生民立命」，即不因「遭命」、「隨命」而喪失其「正命」。本自易教與中庸。使無依之民命再獲歸屬。對未來，張氏云：「爲萬世開太平」，排除干戈動亂，以成「大同」，永絕人患，本自「禮教」。以道之教言，如合於「立心」形上學則「人心」即「道心」矣。而「精」、「一」之「中」道，可稱爲歷史之「正道」矣。劉彥和有云：「六藝附庸，蔚成大同」，大有復興傳統再造中興之豪情。

洛學二程不取邵雍「以物觀心」的反觀說，傳濂溪「太極圖」說。但大程子（明道）學本中庸，主「氣的一元論」，有直觀的機能論，爲陸象山心學所宗。小程子（伊川）學本大學孟子，主「理氣二元論」又爲結構論，爲朱熹理學之始。如此，濂洛二系與關學對已暗昧無光的漢唐古學再顯身手，氣壯山河，華參造化，何其盛耶？由洛學傳至南宋而有贛閩二系。程朱學派，以閩學朱熹爲主體，作「近思錄」，所謂

「成物，知也」，道學間，收功於「平天下」，爲外王之學。顧學陸象山將大程子之傳又爲「內聖」之學，所謂「學苟知本，六經爲我註腳」，尊德性，「成己仁也」，歸功於自我價位之提升。程朱被指爲「支離」，言「心、性、才、意、志」，長於結構，象山被指爲「簡易」，長於直觀的「機能」，則由鵝湖寺朱陸之會以別爲兩途。良非痼疾。自政治以言，北宋開文治，乃不免亡於金兵之動武。南宋康王構掄安江左，亦終淪爲蒙古兵的犧牲品。是故，心性之學，只知有天理物理，而無情理事理之驗證，徒成空談。內聖外王不足以禦敵立國。明體有餘，達用不足，明清之儒乃多反省。歷史的重演，寧非「誤會」！

元代窮兵黷武，不用文化，不反牢而亡。明祖朱元璋出身僧侶，再振大漢天聲，傳國二七七年。自永樂而下，昏君奸相，充斥朝班，政道黑暗。卒有思宗殉於流寇，南明亡於宦官。武宗朝姚江王陽明學宗孟子作「傳習錄」稱「陸王學派」，實與象山不同。其標「心即理」形上學，「致良知」心學，「知行合一」行爲論，有「活孟子」之雅號。針對此政情而懷救世之雄志，但並未點亮權奸的黑心惡心，桂王遠遁西南，而明社以屋。如此，宋明兩朝之分，不亡於天理，乃喪於人欲。道學云乎哉。

初清「宋學」如順治朝之黃宗義作「明夷待訪錄」，唐甄作「潛書」，陽明之傳也。北人孫奇逢作「理學宗傳」，李顥作「四書反身錄」，漸啓反省之幕。崑山顧炎武的「日知錄」爲考據之先聲，均不低頭於新朝。湘人王夫之作「四書稗疏」，擴及史論「讀通鑑論」、「宋論」，仍爲宋學之反省。以老莊解儒，並無新義。陸世儀的「思辨錄」，爲學統作反獨性之思考。康熙朝以朱學四書堅，陸隴其作「四書大全」，又有「困勉錄」、「問學錄」。故國喬木，仍未作思想上的投降。因之，雍正作「大義覺迷錄」以警告反清復明的暗流。盛清乾隆初，雷鉉（翠庭）有「自恥錄」，不爲「漢學」所動，良知自責，堅守尊德

性之傳統。道光而下，清祚日衰，唐鑑（鏡海）作漢宋二學之「師承記」，結束了前嫌，在開民主革命的新門。這是一種學思的巨流。

在理路上，如孔子所稱：「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曲成萬物而不遺」（易，繫辭），余繫諸心性之微，天人關係，古人參究至多，孔曰「參天」以人居客位，孟曰「事天」以人居下位，墨曰「法天」以人居屬位，道曰「同天」以天人同位。然天人之際，道曰「感應」，人天相通，荀曰「分立」則主「天生人成」。以天為上位，人物屬下位則一。筆者生平治學五十年，發本儒道佛三家兼及諸子理學以創筆。昔孔子有「九思」，魏徵有「十思」，茲參以西學融為十錄。以「訪問錄」開路，以「決疑錄」、「論學錄」收尾。以「學問錄」打通「學養」之門，以「反省錄」為「處世」、「情理」之鎖鑰。溝通心性歸往天界之管道。十錄有「連環性」亦具「統一性」。不揣淺陋，敢以此為「醒心」、「補心」、「救心」之劑，用啓蔽塞。易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繫辭上）。以重心對輕心，以細心對粗心，以正心對邪心，以善心對惡心。倘能用以化除偏心私心黑心，「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足矣。

溯自孫黃辛亥革命（一九一一）成功，摧破了滿清二六八年的帝王統治，改元民國，復歸漢統。不幸國家多難，日俄交侵，外來的惡心、邪心勢力先有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一九三一—一九四五），繼有反人文反宗教的外來赤色全面顛覆奪國侵略，使中國本土文化傳統，化為神州巨變的灰燼。（一九四九）迄今已達三十六年之久。卜居海島，面對此史無前例之變局，不能不寒慄於懷。（見決疑錄）丁壯而出，皓首未歸，焉能不興陸放翁之嘆。（見後）昔孟子有云：「仁者無敵」（梁惠王章），晉陶靖節「手撫無絃琴，三嘆有餘音」。（見陸象山引「心詩」）人生至此，四大皆空。然善必勝惡，正必殛邪，信心老而彌堅。茲

文執筆於「眼花撩亂」之時，步履維艱之歲。前瞻有限，回顧茫然。擲筆之餘，感同潮湧。

本書以儒爲經，以道佛爲緯，爲綜合性的治學簡報。要言不繁，題名「學思」者，則「反身」、「自恥」、「困勉」、「潛書」之義俱在其中矣。在所作文史哲三學內，尚有「文學叢話」（一九四二版）一稿未列入，其中「論學錄」僅列最近五六年富哲學性著錄入內，難免有「書不盡言」之憾。十錄各自成「單元」而乏有「邊際關係」，故引言不免有重出處。世無「十全十美」的人事物。近五十年來，筆者曾參與五五「國府還都」大典（一九四六），侍立於最高統帥蔣公身旁，（中山陵）乘機參謁 國父中山先生陵寢，畢生難忘，值茲耄老之齡，帶病握管，野叟獻曝，非所以自彰，乃聊以自抒一世紀之觀感而已。虎不首邱，葉不歸根，所謂「一身報國有餘恨，兩鬢向人不再青」（陸游）是以不能不對境傷懷。世變方殷，聖學日微。若荀子云：「養善和樂」，三教互證，勢難兩全。附錄中，「師友訪道錄」，不無溢美之辭，愧不敢當，亦姑存以爲此生紀念云爾。世有「惡心」「黑心」「賊心」之歹徒，「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自當引以爲戒。

依次本書列爲所作第三十二種，大學用書第二十二種，亦即孔子所謂「絕筆」而弗敢比於「春秋」。是爲序。寄以偈云：

七五走馬險關頭，①

世間離亂鬼神愁；

春秋獲麟孔絕筆，

戰國鬼谷設釣鉤。②

赤禍逞惡能幾時，③

歸心自由足千秋。④

翹首青天白日幟，

王師壺嶼定九州。⑤

註：①見「年譜」（中國哲學的統合精神）（維新書局）。

②參見：法家哲學體系指歸（商務）。

③參見本書「決疑錄」。

④投奔自由反證鐵幕已爲人權巨浪所冲破。

⑤陸游詩：「明知死後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中國文學史，帕米爾書店）

說明：

①本序文爲本書全文之總前言。

②參拙作「哲學概論」（帕米爾書店）。

③參儒、道、佛、法各書序文（幼獅書店）。

④分見各錄的註解。

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日）

序於寶島寓次，時年七十五歲

執教「法家哲學」於輔大哲研所博士班

凡例

●宗旨：本錄以「反省錄」、「生死錄」、「決疑錄」爲體，以「學問錄」、「修養錄」、「處世錄」爲用，作哲學性、宗教性的簡報。

●範圍：本錄以儒、道、佛、耶、墨、法等家有顯著錄爲談論的範圍，未涉其他教義。

●體裁：本錄取記敘體，與語錄體、議論體、筆記體，均不相同。本錄中「訪問錄」、「感遇錄」，均係備考性質。

●取材：本錄以所涉及問題重點，爲取材繁簡多寡之決定。不主一家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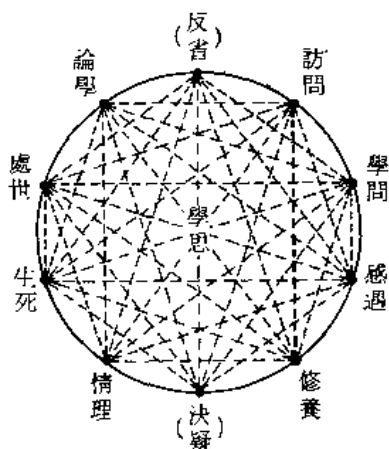
●目的：本錄中「情理錄」、「學問錄」、「論學錄」係爲宗旨而設計，以爲實現了知生死爲目的。

●篇幅：本錄共十篇，所列「附錄」係爲參考，紀念而列入亦屬作者，綜續生平所作所感之存記。

●引據：本錄各篇引據，未詳註出處，擇要註明或註明拙作，現代學者著作名稱。化繁就簡。

學思錄 目次

第一：訪問錄（序錄）	一
第二：感遇錄	一八
第三：學問錄	二六
第四：修養錄	三八
第五：反省錄	五二
第六：處世錄	六二
第七：情理錄	七六
第八：生死錄	八六
第九：決疑錄	九九
第十：論學錄（論文錄）	一二一
結語	一二二
●十錄順序關係圖●	



● 本錄附錄 ●

(1) 師友論學錄(信函)	二〇四
(2) 國外學人訪道錄(英文)	一三四
(3) 滄浪閒話	二五二
(4) 感慨話當年(回憶錄之一)	二六六
(5) 作者年譜(續)	二七〇
(6) 門生感知錄	二七七
(7) 作者著作一覽表(增補)	二九一
後記	二九九

第一：訪問錄（序錄）

范菊芸

(1) 您曾從梁任公、鄧之誠、張君勱、張東蓀、歐陽竟无、馬叔平等大師問學，請您對民國初年的學術界作一瞰覽如何？

民國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之間，老一輩子的歷史家、哲學家、文學家、考據家，以及研究西方哲學的回國學人聚集一堂，可以說是個中國舊學術反省或研究的時代，也是西洋文化的接受與中國文化融合的時代。這一個時期在中國近六十年來的學術過程中，是一個開關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

我有幸與這些清末民初極成功而有名望的學人相接觸，產生師承關係，跟隨他們吸收有關中國文化的歷史根源、思想精華及西洋文化中的哲學、文學，這是我畢生的徼倖。

這個時期，西洋文化對整體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很新穎的東西，一般青年用好奇、追求的心理，來研究西洋文化如文學方面、藝術方面、史學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在胡適之前後的人，如吳宓、朱自清、鄭振鐸、朱光潛等是研究西洋文學，金岳霖、張東蓀是研究哲學。他們無論在文學方面、歷史方面、哲學方面的治學方法都採取西洋治學的方法，因為這時所有新派學者都很講究方法論的，也就是重視邏輯思想。如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吳宓，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以西洋文學的觀點來看中國文學，主持天津大公報文

學週刊，我也參與寫作。這是民國二十年前後，在文學、歷史、哲學方面屬於新派的人物。

屬於舊派的人物有章太炎、劉師培等。尤其是章太炎先生所領導的四大弟子：汪旭初（東）、但燾、黃季剛（侃）、朱希祖，都屬於古文學派，在當時有很大的號召力。章太炎先生無論在思想、六經、歷史，甚至佛學、道家的研究上都有獨到的地方，真不愧為國學大師。（詳見拙作「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變遷史」）

當時，在觀點上與他們相抗衡的，還有考古學派的人物。考古學派於民國十幾年至二十幾年之間，在學術上也是非常地位的。這一派是清末今文學疑古學派一脈相傳下來的，如崔東壁、閻若璩，延長到民國初年而專門從事考據學。（類似大學所開的訓詁學、校勘學、目錄學等歷史考古，都不外乎考據學的範圍）這一派學者，在民國初年最受人重視的，以顧頡剛先生為中心。

顧頡剛先生在時間上較晚，任北大教授，燕京大學教授及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主辦「通俗編刊社」，發行的定期刊物就是「古史辨」。與「古史辨」平行的是「禹貢」，也是顧頡剛先生所發行的，這個比陶希聖先生所編的「食貨半月刊」更早。

「食貨半月刊」不外乎財政、經濟方面的考古，「禹貢」則以書經為中心，是地理的考古，出了八十二期（23年3月至27年7月），古史辨偏於歷史考古，由古文尚書、今文尚書的問題，而又擴及六經、十三經、諸子百家等真偽歷史的考據，路線追隨清末考證、疑古的路線。

顧頡剛先生之外，另有師範大學的錢玄同先生，筆名「疑古玄同」，及劉半農先生（屬語言方面）。據我了解，考據學派的人物不如古文學派多。古文學派中，和章太炎先生同具聲望的有湖南傅增湘先生（

傅先生曾任湖南省長，研究地方誌），其次爲熊希齡、劉春霖（狀元）等都與章太炎先生站在同一線上的。比較這二派，在學術界都很受重視，他們各有千秋，各有短長。古文學派如太炎先生所挖掘中國文化的根源是十分有深度的，而且所言、所文皆鑿鑿有據。他不僅對古文經學、歷史、佛學深有研究，西學方面，對當時由嚴幾道、林琴南所翻譯的如達爾文、赫胥黎的新思想也很有研究，所以他雖然屬於古文學派，但實際上是新進人物，思想並不守舊、頑固，爲名副其實的飽學之士，有自己的主張與見解，並不是做古人的隨從者，這是他最可貴的地方。

疑古學派如錢玄同、顧頡剛這一派實力則較弱。當時疑古成風，凡是古傳下來的東西，都認爲是有疑問的、僞託的、或是後人僞造的，但是他們所提出的考據，在方法上、引據上是不夠的，他們雖然也引用科學方法、歸納方法，但對於他們自己所提出的疑古問題，却拿不出實在的證明來。胡適之先生也算是這派人物，他引用經驗學派杜威的話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論調，但是疑古學派提出對古人問題的疑難，却拿不出實在的證據來，「拿出證據來」這句話也是胡適之先生提出來的，什麼問題都得拿出證據來。他們提出對儒家經典的疑問、對道家經典的疑問、法家經典的疑問，可謂百無一是，問題重重。如胡適之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謂諸子不出於王官論，這就是大膽的假設，大膽的假設是可以的，但是他並沒有拿出證據來。另一方面，就古文學派來講，他們認爲諸子出於周初的「史佚」，周初的史佚爲史官，傳到老子，老子爲道家者流，蓋出自史官，所以胡適之先生所謂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在古文學派來看是不成立的，因爲他沒有證據。

顧頡剛先生辦的「古史辨」中「諸子通考」一冊，對諸子百家均有懷疑。如明朝胡應麟謂「僞託之書